

# 美国“走出遏制”战略业已实现

潘 锐

自布什总统1989年5月提出“走出遏制”的对苏新战略以后，苏联、东欧形势发生了一系列剧变，与这一剧变密切相关，德国获得了统一，从而使战后形成的美苏主宰世界的雅尔塔体系彻底崩溃。而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关键在于苏联。由于苏联对“走出遏制”战略作了积极的回应，布什政府不再怀疑戈尔巴乔夫国内继续改革、国际上与美合作的诚意，布什因此宣称：“我对（苏联改革）充满信心，希望改革进程继续下去”。美国认为，美苏之间“既符合美国的利益又符合苏联的利益的长久的互利点”在增多。美国对苏“走出遏制”战略业已实现，美苏关系从而由对抗进入了合作的新阶段。

## “走出遏制”的实现

美国“走出遏制”战略至1990年底已实施19个月。其目标“比简单地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要大得多”，它寻求的是“使苏联融合到国际社会中来”，使“苏联重新回到世界秩序中来”。具体而言，它包括：（1）要求苏联大幅度削减军事力量；（2）明确摒弃“勃列日涅夫主义”，保证东欧各国的自决权；（3）同西方合作，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冲突问题；（4）实现国内政治多元化，尊重人权；（5）与西方协力解决急迫的全球问题。

“走出遏制”战略问世以后，特别是经过1990年整整一年对苏联的观察，对照上述具体目标，美国可以认为，其对苏目标已大致实现。

第一，苏联大幅度削减军事力量方面。继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大单方面宣布裁军50万，为西方送上一份“圣诞礼物”之后，1989年，苏联作出重大让步，放弃进攻性战略核武器谈判与战略防御系统（SDI，即星球大战计划）联系起来的立场，美苏签署了关于化学武器的谅解备忘录，并就核查、互相通报军事演习等达成协议或谅解。1990年2月，贝克国务卿访苏，在妨碍核谈判进展的海基巡航导弹问题上取得突破，双方同意贝克的设想，即以声明的形式公布各自拥有的巡航导弹数量，这一声明具有政治约束力而不具有法律效力，从而不在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里对这类导弹作严格的限额规定或进行复杂的核查。由于美国在海基巡航导弹上具有相当优势，这便是苏联所作的又一重大让步。1990年6月，华盛顿峰会上，美苏签署了《关于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的联合声明》，概述了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取得的进展，并重申年底前签署（看来需91年签署了）。联合声明规定双方陆基、海基导弹和运载工具以及重型轰炸机将削减到1600件，携带的弹头减至6000枚，削减进程分三个阶段在7年内完成，并附有严格的核查措施。峰会上，美苏并就限削化学武器达成协议，即8年内把各自化学武器削减到同等水平，随后的2年里销毁剩余的全部化学武器。美苏还达成把地下核试验爆炸当量限制在15万吨梯恩梯以下的协议。1990年11月，包括美苏在内的欧安会34国签署了欧洲裁减常规武器条约，条约规定，北约16国和华约6国在今后3年内把它们拥有的坦克、装甲车、火炮、作战飞机和攻击型直升机削减到同等的比目前低的水平，并确保任何一方都难以在欧洲大陆发动突然袭击。由于苏联在欧洲的军队和常规武器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因此根据条约，单单在军队人数和作战飞机方面，苏联就几乎将单方面裁减12万人和2100架战斗机。

条约从而达到了西方谋求削减苏联在欧洲常规军备上的数量优势的目标。条约的签署标志着东西方冷战的最终结束。综上所述,美国不能不相信,苏联确实在大幅度削减军事力量。正是美苏军备控制进程的加快,带动了两国关系的全面改善。

第二,东欧诸国剧变之发生除了其内部因素之外,苏联调整其过去的干涉东欧内部事务的政策以及苏联国内变革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的外部条件。建立“一个开放、统一和自由的欧洲”是“走出遏制”战略的重要内容,布什在一次演讲中说:“冷战是以欧洲分裂而开始的。只有当欧洲统一时,冷战才可能结束”。并向苏联呼吁:“世人等待的时间太长了,现在是时候了,让欧洲成为一个集体,让它自由吧”。苏联一定程度上响应了美国的呼吁。在1989年,德国统一还是很遥远的事,连最大胆的预言都难以想象它仅仅一年后就得以实现,1990年年初,德国统一也未能提上议事日程。促成德国统一的,表面上似乎是东欧剧变,但其实更重要的应是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转变。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彻底否定了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苏联不仅没有干涉东欧事变,使其逆转,相反,即便美国也不得不承认,东欧事态的变化与发展倘若没有戈尔巴乔夫的默许和支持是难以想象的。目前所披露的事实亦证明了这一点,东德的变化即最能说明苏联所扮演的角色了。苏联不仅同意东德并入西德,而且终于作出让步,按照美国所希望的同意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苏军将逐步撤出原东德领土。苏联对东欧国家所采取的政策从而使布什“自由统一的欧洲”的设想成为可能,并直接促成1990年11月欧安会34国首脑会议的召开,将持续了40多年之久的冷战埋葬。因此,国务卿贝克称1989年东欧的变革是本世纪最具积极意义的。

第三,在解决地区冲突问题上,美国认为两国关系亦取得进展。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5月致布什的信中写道:“我同意说,苏联和美国在地区问题上的富有成果的努力将导致两国关系中的良好愿望的潜力不断增长”。从那时起,美苏在地区性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合作。1990年2月,尼加拉瓜举行了自由选举,这是美苏达成秘密谅解的直接结果。《时代》周刊称赞这一事件表明美苏“可以共同为最困难的冲突而工作”。8月2日,美苏外长伊尔库茨克会谈之后,双方就阿富汗问题达成共识,希望阿富汗在联合国主持下,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促进内部问题的解决。在柬埔寨问题上,由于贝克7月18日宣布的美国对柬新政策,美苏看法趋于接近。美苏在地区冲突问题上合作的典型当推海湾危机问题。危机爆发后,苏联即谴责伊拉克入侵,投票支持安理会有关对伊制裁及谴责的各项决议。苏联《消息报》认为,鉴于苏联同伊拉克的特殊关系,这在5—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是美苏再次敌对起来,便是苏联采取中立立场。海湾局势的发展使得美苏首脑9月9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了紧急会晤,美苏共同表示不能容忍伊对科的入侵,呼吁伊无条件从科撤军,释放被扣在伊和科的所有外国“人质”。但在具体解决步骤上美苏存有分歧,即美国保留军事解决办法,而苏联强调在联合国范围内的政治解决。然而,经过美国的说服工作,11月29日,美苏在安理会一致投票赞成授权对伊拉克使用军事力量的第678号决议,从而表明苏联已从原有立场上后退,而仅仅一个月之前,戈尔巴乔夫在同法国总统密特朗会谈之后还坚持,“用军事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能接受的”。这是美苏在地区冲突问题上合作的最新进展。虽然中东战争爆发之后苏联的态度究竟如何尚难预料,但美国对苏联在地区性问题上的合作已经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第四,美国满意地看到,苏联国内除苏共外,已经出现了其他党派和政治势力,苏共的权力已遭致削弱,国家行政权得以加强;苏联国内的民族情绪高涨,不仅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而且在其它加盟共和国中要求独立的人们已形成一定的政治势力,最高苏维埃和各

级苏维埃组织已实行了民主选举，叶利钦便是通过选举击败戈尔巴乔夫提名的对手而当选俄罗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布什总统因而断言：“戈尔巴乔夫总统在国内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进行了非常根本的改革，因此时钟无法再倒转”。美国由此认定苏联正在走向政治多元化。

第五，华盛顿美苏首脑会议上美苏两国签订了海洋方面的合作等协定；美苏同意在环境保护、反对恐怖活动和毒品走私以及第三世界的军备竞赛等急迫的全球问题上加强合作。

总而言之，美苏关系在过去19个月中、尤其在1990年内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由此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美国“走出遏制”战略的具体目标业已实现。

## “走出遏制”之后

1990年苏联逐步“向国际社会靠拢”，美苏关系的大幅度变化，使美苏之间持续了40多年的对抗格局从此寿终正寝，而由合作——竞争的新格局取而代之，美苏关系因而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苏两国之间对抗的色彩将逐渐减少，而合作——竞争则将居主导地位；美苏之间的军事竞争将趋减弱，不会发生两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双方的“代理人”战争亦将销声匿迹；美苏关系将主要体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而在世界经济、政治、外交以及地区冲突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方面将有更多的合作与协调。新时期的美苏关系与70年代美苏之间短暂的“缓和”将有着质的区别。

当然，美苏关系的转变并不意味着美苏结成同盟或伙伴关系。美国强调，美苏关系的发展必须以苏联国内正在发生的“内部革命”的性质为基础，取决于苏联国内“政治权力的多元化，经济生活中的权力下放，以及早就认识到的要在自愿的基础上实现多民族的联合”。美国仍然认为，苏联是世界上唯一有实力对美国进行军事威慑的国家；美国倡导的“新大西洋主义”强调要以北约为基础来筹建未来的欧洲，而北约本身乃是冷战的产物，是一个军事组织，苏联对此不能不存有疑虑。苏联方面，戈尔巴乔夫倡议的“欧洲大厦”计划主张欧洲人的欧洲，其实质是将美国势力从欧洲排挤出去。苏联亦坦言与美国有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目标。因而美苏在合作的同时仍难避免矛盾和竞争。

（1991年1月稿）

〔责任编辑 刘庆芳〕

---

（上接第37页）仍在继续的教科书、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日之丸”、“君之代”（学校悬挂国旗、唱国歌）的争论，其根基无不出自保守阵营企图翻案的“民族主义”。这种右倾思潮的沉渣泛起，将为中日关系埋下摩擦火种，干扰友好合作主流。

（四）贸易往来受市场机制“无形之争”的调节。从过去近20年的中日贸易发展看，有一个很规律的“五年周期现象”。按日本式说法，即：“日中贸易反复出现涨潮和落潮”。细言之，双边贸易曾多次经历了中国需求膨胀——日本暴雨般出口——贸易不均衡加剧——中国市场缩小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第一次在1974年，第二次在1978年，第三次在1985年。究其原因，即是当中国市场活跃时，热衷于抢占市场份额的日本企业基于“盈利至上”，“法不责众”的想法，蜂拥而入中国市场，展开暴雨般的出口攻势，最终导致双边贸易严重失衡。为此，值此中日贸易大幅回升之际，日本官方若不对企业、商社严加“指导”，很可能使上述周期重现，从而损害中日贸易长期稳定。（1991年4月稿）

〔责任编辑 刘庆芳〕